



No.C2002005      2002年3月21日

“三农”问题与我国农村的未来发展

北京大学 林毅夫

# “三农”问题与我国农村的未来发展

北京大学 林毅夫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生产发展迅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按可比价格计算，2000年农林牧副渔业总产值相当于1978年的3.27倍，年均增长率高达6.4%，为同期世界各国之冠。但是，90年代后期以来，农民收入增长出现停滞现象，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趋于扩大。实现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6%，曾经被认为是农村奔小康所必需达到的目标，可是这一目标自1989年以来，除了1996年外，其他年份都没达到。2000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仅仅比1999年增长2.11%，和1997年相比也仅仅增长了10.5%。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农村人口在我国总人口中还会占相当大的比重，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始终会是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过程中的大问题。当前农民收入增长停滞，城乡地区收入差距扩大，“三农”问题引起各方重视。“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是在保持农业的持续、稳定发展的同时，增加农民的收入，缩小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的差距。

## 一、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启动农村市场，增加农民收入<sup>1</sup>

从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生产年均增长率比人口年均增长率高出5.1%，从中外农业生产的历史经验来看，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但是，中外的历史经验也表明，农民收入的不断提高，不能仅仅依靠农业生产的不断增长，更重要的是有赖于农村劳动力随着经济增长不断向非农产业转移，以及农业生产结构不断向高附加值的产品调整。<sup>2</sup>改革以来，我国农村经济一直沿着上述的两个结构调整的方向在进行，但是从1997年起，农村产业、就业出现了逆向调整，乡镇企业发展滑坡，1998年、1999年农村工业从业人员净减少1000万人左右，而农业从业人员不减反增，农民收入增长也就出现了滑坡、停滞的现象，“三农”问题因而转为严峻。

一个国家农业比重的持续下降和农业就业人口的持续减少，前提是该国家非农产业的不断增长，可以容纳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大量劳动力。只有这样才不会在城市出现一批无产、无业的游民，成为一个新的社会、政治问题。1997年底，我国国民经济通货紧缩的势头开始出现以后，一方面，生产能力普遍过剩开始成为国民经济中的主要问题，城市企业开工不足，导致投资下降，新增就业机会减少，农民难于转移到城市就业，阻碍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就业结构调整。

<sup>1</sup> 本节根据11月15日在中南海怀仁堂汇报的《农民收入增长困境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一文整理。

<sup>2</sup> 由于农产品需求的收入弹性和价格弹性都很小，如果没有农村人口就业结构和农业生产结构的不断调整而仅仅是农业生产的迅速增长，必然会导致“谷贱伤农”，农民的收入不会随着农业生产的增加而增加。

另一方面，在生产能力普遍过剩的情形下，技术、管理、产品质量水平较低的乡镇企业受到的冲击远比城市企业严重，不少乡镇企业停工、破产，使“离土不离乡”的产业、就业结构调整逆转，不少农村劳动力回流到附加价值较低的农业，并牵连乡镇政府普遍高额负债，据调查全国每个乡镇的负债平均高达 400 万元，这些债务最终必须由农民来归还，使农民的负担问题更为雪上加霜。

在生产能力出现普遍过剩时，一般企业很难找到好的投资机会，投资意愿必然下降；同时，企业开工不足，设备闲置，利润下降或亏损，职工将面临企业破产和失业的危险，导致职工对未来的收入预期下降，消费趋于谨慎，加上我国这几年的医疗、保险、教育、就业、福利制度改革增加了职工未来的支出预期，整个社会的消费意愿因此下降。投资需求和居民的消费需求在 2000 年占我国按支出法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的 84.8%，当企业的投资和居民的消费意愿双双下降，而生产能力还在以较快的速度增长时，则会使原来生产能力过剩的情形更为严重，这又反过来进一步导致投资和消费的意愿更加不振。因此，要实现农民就业结构和农村产业的调整，解决我国当前农村、农民、农业的问题，当务之急是启动内需，消除国民经济中的过剩生产能力，遏止通货紧缩的势头。

生产能力的普遍过剩是存量的过剩，要在短时间内消除普遍过剩的生产能力必须要启动一个巨大的有支付能力的存量需求才能实现。在一个发达的市场经济中，有支付能力的需求都必然已经得到满足，因此，不可能找到一个这样的需求存量，这是为什么当一个市场经济国家出现生产能力普遍过剩的通货紧缩现象以后，总是旷日持久、国民经济每况愈下而无法走出困境。但是，我国是一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国家，基本上是城乡二元经济，城乡市场隔绝，农村消费条件不充分，市场发育不完全。在占全国总人口 63.8%，户数占三分之二的农村地区，和生活有关的基础设施仍然十分落后，不仅电网老旧，电压不稳，而且，电价高昂，有一半的农户没有自来水，大大限制了农村地区对现代消费品的需求。2000 年农村每百户居民彩色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的拥有量分别为 48.7、12.3、28.6，仅为同年城镇居民拥有量的 41.7%、15.4%、31.6%。2000 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2253 元，比 1991 年城镇居民人均收入 2025 元高出 11.3%。2000 年上述三大件的价格仅为 1991 年时的一半或更低，但 2000 年农村居民的拥有量也仅为 1991 年城市居民的 71.1%、25.3%、35.5%。可见，不是收入水平，而是基础设施不足是限制广大农村地区的居民实现其消费意愿的主要原因。

根据国家统计局农调队和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在 1999 年 12 月对全国 18796 个农户所做的抽样调查和计量分析发现，农村电价每调低一毛钱，对彩色电视机需求的刺激作用相当于农村人均纯收入提高 370 元；对电冰箱的需求相当于农村人均纯收入提高 667 元；对洗衣机的需求相当于农村人均纯收入提高 909 元。如果做到农村居民用电和城市居民同网同价，在农村安装卫星电视地面接收

锅做到村村通电视，建水塔实现村村通自来水，农村地区将会很快出现一个家用电器的消费高潮，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将不再有过剩的生产能力。水、电等和生活有关的基础设施问题解决后，农村地区还会自发地掀起厨房革命、厕所革命等和改善生活质量有关的建设高潮，把许多制造业现存的过剩生产能力消化掉。

而且，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项目如修筑乡村公路，架设乡村电网，建立自来水供应系统和广播电视接收、发送装置等，投资规模一般不大，投资较为分散，与主要为城市服务的基础设施项目相比，具有投资少，工期短，见效快，经济和社会效益好的特点，使用的物质投入以国内生产为主，对国内需求的直接刺激作用更为明显。这类基础设施建设高度劳动密集，以使用农村廉价劳动力为主，所以，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还能够在农村地区创造出许多就业机会，直接增加农民收入。

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实际上是农村现代化所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任何一个经济要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离不开城乡的协调发展，城市现代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要向农村扩展，而良好的农村基础设施恰好是城市文明向农村延伸的桥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有助于推进农村现代化，有助于缩小城乡和地区间的发展差距，为广大农村居民参与经济发展过程，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创造必要条件。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将使农村经济和社会事业长期受益，农村经济的发展进而可以扩大全国的市场规模，不断为全国经济增长提供新的空间，提升经济发展水平。

通过加强农村与生活有关的基础设施建设，可以启动农村的消费市场，消化掉过剩生产能力，使国民经济走出通货紧缩的困境，国民经济可以恢复健康、快速、持续的增长，这样农村劳动力才可能有机会不断转移到非农产业部门就业，进而实现农民收入的持续增长。以积极的财政政策来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是启动国内需求、消除过剩生产能力最有效的措施，也是当前实现农村劳动力就业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增加农民收入，解决“三农”问题的首要政策。

## 二、深化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发育和完善全国统一的大市场，缩小地区差距

我国各地的发展水平差距很大，东中西部之间收入差距如何不断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而缩小，是我国在新世纪解决“三农”问题所要克服的难点之一，关于此点，建立全国的统一大市场是关键。

按照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缪尔逊提出的“要素价格均衡理论”：在没有交易成本的前提下，要素禀赋结构不同、比较优势有异的地区，如果能够按照比较优势来决定产业结构，然后，通过统一的产品市场，进行地区间的产品串换，那么，各个地区间劳动者的收入就会随着经济发展而趋同，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

就会成为拉动另外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动力。以粮食为例，当前，我国东部地区相对于中部地区人多地少，工资水平高，因此，粮食这种土地相对密集的农作物在东部地区不具有比较优势。如果有了全国统一的大市场，当东部地区随着经济发展，土地和劳动力机会成本提高，粮食生产就会越来越不合算，东部地区自然会缩小粮食生产的比重，增加向生产粮食有比较优势的中部地区的购买。粮食市场的价格将会相应上升，中部地区以粮食生产为主的农民也就能从粮食增产中得到增收的好处，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也就会成为中部地区经济发展、农民增收的拉动力。<sup>3</sup>同样的道理，当东部地区越发展，也会增加购买具有资源比较优势的西部地区的资源密集型产品，推动该类产品价格的上涨，成为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的拉动力。这样，东中西部的收入差距就会随着东部经济发展的扩散效应而不断缩小。所以，要缩小地区收入差距，首先必须建立全国统一的产品大市场。

当然，地区之间的产品交易是需要交通、运输、仓储、信息等等成本的，因此，也就不能完全依靠“要素价格均衡理论”的道理来使各个地区间的收入得到均等。地区收入差距的进一步缩小还有赖于要素的流动，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第二层意义是发育和完善全国统一的要素，尤其是劳动力的市场。东部地区随着经济的发展劳动力越来越短缺，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有利于中西部地区富余的劳动力向就业机会较多的东部发达地区流动，流动出来的劳动力可以为中西部地区的发展积累资金、信息和技术力量，而且，可以使留在中西部农村地区的劳动力有了更多的土地资源来从事生产创造收入。这样，东中西部地区通过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有机结合，东部地区的发展就会成为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拉动力，东中西部地区收入的差距也就能够随着经济发展而逐渐缩小。

我国现在已经正式加入 WTO，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立和完善也是实施 WTO 的非歧视和国民待遇原则，迎接加入 WTO 所带来的挑战和机遇的前提条件之一。如果不尽快建立和完善全国统一的大市场，不但违背 WTO 的原则和我们的承诺，而且东部发达地区有可能抛开中西部地区，利用高度开放的新形势与国外开展分工合作，比如从国外进口粮食等土地密集型农产品，以及资源密集型矿产品，这样，东部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比较优势发生变动而让出的市场和转移出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就很有可能落到了境外，我国的中西部地区就无法从东部地区经济发展中获得拉动力，地区收入差距缩小的愿望就会落空。

建立和完善全国统一的大市场也将有利于政府调控宏观经济运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作用，政府将经济工作的重心由参与和直接干预生产经营转向发育市场，然而，这绝不意味着政府调控宏观经济的能力

---

<sup>3</sup>同时，只要粮食价格上升，中西部地区农民产粮的积极性提高，中部增产的粮食将能够弥补比较利益低的东部地区减少的产量。并且，粮食市场的范围越大，各地区产需余缺互补的可能性就越大，粮食市场价格的波动也就会越小。

被削弱了，恰恰相反，通过为农民保护产权，活络市场，替农民创造一个能节约交易费用、能开展公平竞争的经济环境，不仅政府宏观调控经济运行的有效性将大大提高，而且调控的面也大大拓宽了。(1) 对于政府来说，只有当整个国民经济运行更多地依靠市场机制，才有可能从应付日常的小事中解脱出来，着重研究和解决一些真正属于宏观经济调控方面的问题。(2) 通过市场发育和经济运行机制转换，政府将主要依靠一套规则而不是一笔资金或审批来协调经济运行，有助于根除政府官员因参与微观经济运行而滋生的受贿、索贿等陋习，使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宏观调控方面。(3) 加入 WTO 以后，我国农业面临特殊挑战，政府直接对农业提供保护和补贴，既违反 WTO 规则，实践中又难以奏效，对于农民来说，在政府规则面前求平等要比在政府计划分配的物资面前求平等容易得多。

虽然经过多年的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但是，目前我国市场体系仍然很不健全，不少地方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和保护主义仍然存在，政府应该继续深化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以建立和完善全国统一的大市场。从市场的特性来说，交换是市场的基础，而产品和要素的交换只有在两个所有者的效益都能增加时才会出现。交换时所需的交易成本越低，交换的效益就越大，参与就越踊跃，市场就越活络。同时，随着市场的深化，生产者面临的市场风险也越大。政府在降低市场的交易成本和风险两方面都有许多工作可做。

首先，就降低市场的交易成本来说，市场交易的硬件，如交通、通讯、金融等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是跨地区的商品和要素流通的必要条件之一。这些体系建设的一次性投资、外部效应和规模经济都很大。为了避免市场发育因这些硬件设施的欠缺而受阻，政府在这些领域负有直接投资和发展的责任，在必要时也可以开放、鼓励民间在这些领域的投资。另外，从表面上看，商品交易是商品从一个所有者转移到另一个所有者手中，而货币则和商品成反方向的流动。但是，商品交易的本质是所有权的交换，所以只有在所有权界定清楚、交易的合同得到法律的保障的情况下商品交易才能顺利进行。在现实生活当中，一些地方政府干预粮食等大宗农产品流通的情形时有发生，这实际上是对农民生产的农产品所有权的直接侵犯，不仅使农产品在地区之间调剂余缺的成本大大增加，而且使地区之间的产业结构变动和比较优势的发挥遇到很大的障碍。以法律的方式界定各种生产要素和商品的所有权，以法律的方式来保障所有权和交易合同，也是政府在发育市场、促进商品和要素流通方面无可旁贷的责任。

其次，市场的风险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生产的盲目性造成的。信息越充分，生产决策就越准确，市场的风险就越小。而且，消费和需求结构的变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准确预测的。但收集和处理这方面信息的外部效应很大，即一方面它的一次性投资很大，另一方面所得信息又可以以供给的边际成本为零的方式让众多农民分享。这些信息由各个分散的农户自己来处理，显然缺乏经济合理性，所以政府在这方面也应该发挥积极的作用，透过广播、电视、互联网定期或不定期

地发布商情预报，指导农业生产，以减少农民生产经营的风险。

### 三、加速科技和体制创新，增强竞争力，迎接入世的挑战，实现农业持续、稳定发展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增长，根据我国和发达国家间存在的巨大技术差距，我国有可能利用这个潜力在新世纪继续维持 30 年甚至更长时间 GDP 年均 7%左右的快速增长。扣除人口增长的因素，人均 GDP 年均增长率有望达到 6%的水平。

人均 GDP 增长会引起膳食结构的改善，对肉食品需求的增加必将导致饲料用粮大幅度增长。同时，我国人口在 2000 年底时是 12.66 亿，预计 2030 年达到顶峰时将有 16 亿，比现在增长四分之一，基本粮食需求会随之大致同比增长。但是我国农业资源禀赋差，耕地面积自五十年代后期以来一直呈减少趋势，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耕地还会进一步减少。另外，经济发展必然伴随工业化、城市化，从事农业的劳动力急剧下降。2000 年时我国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 46.1%，如果能在未来 30 年保持年均 7%的 GDP 增长速度，届时农业就业人口有可能降低到 25%或更低的水平。除了农业就业人口的减少外，经济增长也必然要求农业自身的生产结构随之调整。经济发展导致生活水平提升，对农产品品种选择和质量的要求提高。同时，农业劳动投入成本（包括机会成本）上升，农业生产只有不断往高附加值的农产品转移才会有生命力。尤其，加入 WTO 之后，我国农产品市场将更为开放，农产品只有在品质上、成本上不比进口农产品差，才能有竞争力。

从上述分析可看出，如果我国经济在未来三十年保持快速的增长，对农业将产生两个挑战：一是，在农村就业和农业生产结构调整中，我国的农业能否生产足够多的粮食来养活自己；二是，在经济增长的同时，能否不断提高农业技术水平，引进新产品，并改进现有品种的质量，使农业结构调整能够伴随经济增长而顺利进行。

根据历史经验和发展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一般认为粮食产量增长能够超出人口增长一个百分点就是了不起的成就。如果以此为目标，并假定到 2030 年人口达到 16 亿的水平，那么，从现在到 2030 年，平均每年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为 0.81%，粮食产量每年的增长率目标应为 1.8%，到 2030 年粮食产量应比现在高 70%。在耕地增加的余地很小的情况下，我国未来能否增产这么多粮食的关键在于单产能否不断提高。提高单产的途径有两个：一是增加农业投入；另一是技术进步。但是如果技术水平保持不变，增加要素投入的边际生产力会下降，这一途径潜力有限。所以，满足我国粮食需求增加的主要必须依赖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其实，本世纪以来世界粮食生产的增长主要依靠的就是技术进步导致的单产提高，我国

从 60 年代以来粮食增产也同样是有赖于此。

在 1991-1993 年间，我曾经领导一个研究小组就我国粮食作物单产提高的潜力在全国各地市进行了大规模的实证研究。根据调查，我国现在水稻、小麦和玉米的大田最高单产和大田实际平均单产的差额约为实际单产水平的 1.5~3.5 倍，这个差距代表在作物品种现有光合作用的水平下可以挖掘的潜力。这项调查又发现，如果我国政府对粮食科研给予足够支持，有一半的潜力可以用传统育种的方法改进作物品种来实现。

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粮食生产具有特殊的重要性。自 1959-1961 三年自然灾害以后，我国政府就特别重视粮食科研，而且在许多方面居于世界前列。1966 年国际水稻研究所开发出半矮秆水稻品种，标志着绿色革命的开始，而我国在 1964 年就开发并推广了同类品种，并且于 1976 年开始推广种植杂交水稻，直到 1990 年代初我国仍是世界上唯一大面积生产杂交水稻的国家。所以，只要给予粮食科研足够的重视，依靠传统育种的方法挖掘现有最高单产水平和实际单产水平之间的潜力，就应该能达到每年增产 1.8%，实现在 2030 比现在增产 70% 的目标。如果考虑今后几十年的科技进步，尤其，生物技术在育种上的运用，只要政府给予粮食科研足够的支持，我国一定有能力生产足够的粮食来养活自己。

当然，从经济合理性考虑，达到百分之百的粮食自给自足并不是最佳选择。粮食是耕地密集型产品，我国恰是个耕地稀缺的国家，发挥比较优势，将劳动力更多地用于生产劳动密集的工业制成品和农作物，通过国际贸易适量换取耕地密集型的粮食产品，这样更有利于改进资源配置，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加入 WTO 为此提供了十分便利的条件。

经济增长对我国农业的主要挑战在于前述的第二点，即如何增加蔬菜、水果、花卉、水产养殖品、农产加工品的品种、质量以提高产品的附加价值和农业的竞争能力。我国农业科研体系在粮食科研上有足以傲人的成绩，但在粮食以外的农产品的科研能力还相对薄弱，如何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适应农业生产结构调整的需要，提升这方面的科研创新能力，不断给农业提供高附加值的新产品或改进现有产品的质量，是我国农业未来发展的最大挑战。政府应该加大农业科技投入力度，推动农业科技及成果推广，缩小中国农业与发达国家农业在质量、品种上的差距，并降低农业生产成本。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发展靠的就是科技和体制创新，今后创新的重点应该更多地放在品种、质量和效益的提高上。在体制创新方面，尤其要注意农业科技推广体制和农产品市场流通体制的创新。农业科技推广体制的创新关键是要让广大农民及时、低成本地得到所需要的农业科技创新成果。由于市场秩序混乱，经常发生假种子、假化肥、假农药坑农事件，今后应该配合市场秩序的整顿，彻底杜绝此类事件的发生。由于这类事件一旦发生，给农民造成的巨额损失事后无论

怎么惩罚肇事者也无法挽回。可以考虑改革良种、化肥、农药等重要农业生产资料经销体制，培育大规模连锁经营方式，规范市场秩序和信誉，一旦发生坑农事件，生产资料经营企业也有足够的财力加以赔偿。

为了提高农产品附加价值和与进口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需要加快建立适应现代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农产品市场营销体系，将我国农业生产上的比较优势转化为市场竞争优势。在这方面，政府需要做的是出面组织建立和执行农产品质量、卫生安全标准体系，为广大农民和农产品市场经营者树立明确的努力方向。目前农民对国际市场和外国农产品的质量标准、包装要求、卫生检疫要求等情况并不了解，这些信息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的性质，即使在国外也属于政府各相关部门负责组织实施的管理职责，所以并不是直接的农业保护或补贴，也符合 WTO 规则。只要广大农民有了明确的努力方向，加上全国统一大市场建立所提供的机会，他们自然会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一样，打赢加入 WTO 这场战役，将我国农业发展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在改进品种、质量的农业科研上，除了提高我国自己的能力外，我们还可以加大农业的国际合作，从发达国家或地区引进先进农业技术和品种。在这方面和我国台湾省的合作值得特别重视，我国大陆地区农业科研不足之处正是我国台湾省农业科研体系的长处，两岸农业科研体系在这方面合作的空间很大。台湾农业在 60 年代以后随着台湾经济的快速发展，农业部门也跟着进行了重大的结构调整。大米和甘蔗两大类传统农产品生产相对萎缩，并保持净进口态势，而蔬菜、水果、花卉等园艺作物和水产养殖的生产则依靠农业科研部门和推广体系的卓越成绩和农民素质的提高而大幅度增加，并保持了一定的出口竞争力。但是，目前随着台湾经济的发展，劳动力价格的不断提高，劳动力密集型农产品的竞争力在台湾正在逐渐丧失。加入 WTO 以后，大陆农业可以与台湾开展分工合作，鼓励台湾农民到大陆来投资，将品种、技术转移过来，以加快大陆本身的农业现代化进程。这既有利于台湾的农民，有利于大陆的农民，也有利于两岸的和平统一。

#### **四、发展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创造就业机会，加速农民就业结构的调整**

农村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调整的前提是非农产业大发展，能够不断创造出大量非农就业机会，不断将农业劳动力吸纳到非农就业岗位，不断降低农业就业比重和数量。上述机制是务农农民的收入随着我国经济发展不断提高的前提，因此，“三农”问题的解决还有赖于“三农”之外的非农产业的发展。加入 WTO 以后，政府不再能够给予某一个产业直接的补贴，非农产业的大发展必须是这些产业具备很强的市场竞争能力，这就要求这些产业符合我国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国的比较优势都将是劳动密集型产业。

在讨论迎接加入 WTO 的挑战时，在国内理论界和实践部门有一种广为流传的信念，认为中国应该重点发展资金密集、技术尖端的大企业，只有这样才有实力与外国企业展开竞争，否则民族工业就会在市场竞争中败北。实际上，一国产业的竞争力主要取决于其产品的成本，成本越低的产业竞争力自然就越强。而一个产业的成本高低主要取决于其是否利用了本国的比较优势，比较优势又是由一国的要素禀赋决定的。我国现阶段的要素禀赋是劳动力相对丰富、资本相对稀缺，因此，具备比较优势的产业和产业区段具有劳动力密集的特征。如果我们举全国之力发展资金密集型的大企业，必然需要继续人为压低资本价格，并采取种种行政措施保护资本密集型企业免受市场竞争挤压，结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完善无法完成，国民经济的发展也将出现种种困难而“欲速不达”。

相反，遵循比较优势发展起来的产业因为成本低廉而具有相当强的市场竞争力，因此不需要政府的特殊保护。由于这种产业竞争力强，因而盈利能力强，经济剩余多，资本积累速度快，由此导致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快，资本在我国将逐渐由相对稀缺转变为相对富裕，劳动力反而日益显得稀缺起来。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动将推动产业结构的升级，具有竞争力的产业越来越带有资本密集、技术先进的特征，中国就能够以“小步快走”的方式赶超发达国家。

任何企业和企业的发展都需要有灵活的金融市场的支持。我国目前的金融体系存在许多问题，加入 WTO 以后，我国金融业即将对外资开放，面临的竞争将非常激烈，金融业的改革刻不容缓。当前的要务除了解决国有银行的巨额不良贷款，消除资本市场存在的问题外，最重要的是确立金融改革的方向。

金融体系的功能主要在于动员资金和配置资金，而动员资金的功能其实从属于配置资金的功能，因为资金配置得好，经济的效率高，经济中的剩余就会多，可动员的资金就多，而且，资金配置得好，资金的回报率高，储蓄意愿就会高，在经济剩余中用来作为积累的比例也就多，这样，资金动员的效率就高。资金配置的效率取决于在经济中最具竞争力的产业和企业是否能够得到最好的金融服务。

我国现阶段最具竞争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中的企业以中小企业为主，保证这些企业的融资需求应该成为我国当前金融体制改革的主要方向。对中小企业来说，最合适的融资方式是以中小银行为中介的间接融资，而这正是我国金融体系中最欠缺的一块。这种格局不改变，中小企业的金融需求就很难得到满足，中小企业的发展有障碍，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就不会很顺畅，速度就会减缓，所以发展中小银行，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是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当务之急，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必要措施。

90 年代以后，我国地方性的中小银行在改造各地城市信用社的基础上开始发展起来，但是目前业务量还不大，而且实际运作很不成熟、规范。地方性的中小银行一定要实现商业化，不能由地方政府行政控制，以致成为地方政府的第二

财政，依附于地方政府，甚至成为地方政府背离当地实际和比较优势，进行盲目投资的工具。如果那样，中小银行就不但会与四大专业银行一样不能成为中小企业融资的方便渠道，而且必然会产生众多的不良资产。另外，发展中小银行需要健全金融监管体系，防范可能发生的道德风险。中小银行也不是越小越好，需要有一定规模，以具备必要的分散市场风险的能力。中小银行虽然是地方性银行，也要注意引进银行间的竞争机制，防止人为垄断产生的低效率。

中小企业以民营经济居多，一般在市场竞争中产生和发展，在技术选择上比较符合我国的比较优势，民营经济的发展能够创造出大量的非农就业机会，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要出口，因此对实现农村产业和就业结构的调整具有重要意义。WTO 最重要的规则是非歧视和国民待遇原则，加入 WTO 后我们需要对境外投资企业和进口产品实行非歧视和国民待遇的原则，实际上，我们的当务之急是首先对我们自己的民营经济落实非歧视和国民待遇的原则，所有对外商开放的投资领域都应该更加彻底地向我们自己的民营经济开放，一些不向外商开放的投资领域也应该向自己的民营经济开放。本来无论加入 WTO 与否，我们都应该对自己的民营经济做到这一点，由于长期以来思想观念不够解放和体制改革滞后的原因而没有及时调整到位。行业进入限制现在已经成为我国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现实情况是，许多已经向外资开放的投资领域在政策上也还仍然不允许民营经济进入，民营经济在财税等政策上仍然与外资企业处于不平等竞争地位，甚至与国有企业相比，在体制上还比较容易受到歧视。新形势下，发展民营经济，创造就业机会，投资领域需要全面向国内民营经济开放，为中小企业发展提供广阔的空间。

## 五、结论

改革以来我国农业生产的发展一直很好，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解决“三农”问题关键是要不断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农村产业和就业结构调整是增加农民收入，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农业和农村经济现代化的根本出路。为了加快农村地区各项事业的发展，解决农民增收问题，也为了开拓广大的农村市场，扩大内需，从根本上缓解我国当前国民经济中生产能力普遍过剩问题，走出通货紧缩困境，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是正确的政策选择。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国农民，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农民，家庭纯收入中仍然要以来自农业的收入为主，因此，提高农业生产经营效益是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努力方向。我们应该结合应对加入 WTO 给我国农业和农产品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深化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加快培育全国统一的大市场，开展地区之间的分工合作，充分发挥东部地区经济发展对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缩小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加快农业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依靠科技进步增加农业产量，改进农产品品种和质量，不断依经济发展的要求调

整农业生产结构。依靠体制改革，培育现代农产品营销方式，参照国际标准制定和执行广泛的农产品质量、卫生标准，为农民和农产品经营者提供明确的努力方向，提高农产品附加价值和市场竞争能力。为了推动农村产业和就业结构调整，还需要大力发展我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努力创造非农就业机会，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提供出口。通过发展中小银行体系，解决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融资难问题。配合迎接加入 WTO 的挑战，我们应该首先消除对国内民营经济的投资限制和政策歧视，加快国内民营经济的发展，将民营经济培育成创造非农就业机会的一条重要渠道。上述政策措施的落实将使我国的农业、农村、农民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不断迸发出新的活力，成为国民经济在本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力量。